

●高等教育评论专栏●

[编者按]《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自2006年起开办“高等教育评论”专栏,特约教育评论专家刘尧教授主持。本专栏是以发表教育界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评论为主的常设性特色栏目,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学风。热忱欢迎教育界专家学者,就自己关注的高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撰写成6000~8000字的文章,提供给“高等教育评论”专栏,我们将优先发表您的真知灼见。本专栏实行优稿优酬,对被权威文摘刊物全文转载的稿件进行奖励!诚请教育界专家学者在百忙中赐教赐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学位、职称、单位、职务、邮政编码、通讯地址、联系电话、E-mail等。稿件发到电子信箱:zjjh_ly@163.com。

特邀主持人:刘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教授

本期特邀嘉宾:闫月勤《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政策法规处副处长、编审

袁长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

黄晓慧: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叶李娜: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闫月勤

(1. 厦门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 西南交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 高校高教研究机构是高校设置的、从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高校高教研究机构应是高校内独立设置的二级机构,直属学校领导。高层次化、规模化、特色化、职能多样化、学科化是其发展方向。

[关键词] 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现状;问题;对策

我国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是高校设置的、从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进入“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校高教研究机构面临大量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另外,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高校领导的决策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关系到高校办学质量优劣、发展速度快慢、办

学效益高低。高教研究机构已经成为高校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咨询机构。正因如此,教育部2004年适时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要求高校进一步提高对高教研究机构重要作用的认识,切实加强高教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弄清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设置的现状与问题,探讨其设置与发展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闫月勤(1962—),女,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兼政策法规处副处长,编审,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一、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设置与发展现状

1978年,厦门大学在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先生倡导下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步伐,高教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至80年代中后期,达到1000多所普通高校拥有700余家高教研究机构、高教研究刊物500余份的盛况。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拥有700多家高教研究机构,300多种内部期刊,30余种公开发行期刊,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60多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

(一)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设置类型多样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设置类型:

1. 独立设置型。大部分高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高教研究机构均为这种设置类型。在教育部直属高校44家高教研究机构中有40家属于独立设置的。^[2]这种类型的高教研究机构具有独立的人事、财务权;直属学校领导;研究能力较强;一般拥有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教育研究刊物;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或硕士点。

2. 合署办公型。这种类型一般与教务处或者科研处等合署办公设置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没有专门的人员和经费,无法实现高教研究机构特有的职能,可以说名存实亡,当然也无从发挥作用。这种类型只存在于极少数学校,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仅有3所属于这种类型。^[2]

3. 安置过渡型。这种类型主要是由于学校领导对设置高教研究机构认识不足,将高教研究机构当成了安置所,成为因种种原因不好安排的干部的安置过渡性去处,这些干部又对高教研究没有兴趣,自然谈不上有所作为。结果,不是自生自灭就是在机构精简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取消单位。这类机构曾经有相当数量,新一轮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后,大都因无所作为而被精简。

4. 附设型。这类机构是指在教务处附设一个科室。原因也是学校领导对高教研究缺乏认识,只是为了对外有这样一个机构;或者出发点是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但工作中往往重心倾斜,沦为教务处秘书科,陷于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谈不上研究和发挥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类型也越来越少。

(二)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规模、学科、研究队伍等发展很快

1. 机构规模扩大。许多高校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都发展成为教育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南大学等一批学校高教研究机构内部依不同的研究方向设立了多个研究室。

2. 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迅速。已经拥有了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厦门大学已经成为全国惟一的高等教育学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科研基地,60多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学博士、硕士,促进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高校输送了许多专业管理干部。高等教育学学科已经成为综合性大学特别是理工为主重点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多科性大学的学科增长点。

3. 高教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许多学校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20多年来,高教研究机构产生了大批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繁荣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丰富了高等教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开拓了研究领域,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如厦门大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考试制度研究、高教改革重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的教育经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比较研究;清华大学的一流大学目标研究、教育政策法规研究;广东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被称之为“中国的威斯康星教育思想”对广东省“新大学运动”的研究者与推动者。

4. 研究队伍扩大并日益专业化。高教研究队伍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由各高校热心于高教研究的管理干部、教师组成,专职人数有限。他们实践经验丰富,但理论基础欠缺,研究方向不固定。现在,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充实到各高教研究机构中来,研究队伍日益专业化、年轻化,他们理论基础扎实,又有各自的研究方向,使研究能够深化。如北京大学正是由于闵维方书记等一些国外回来的“海归派”高层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拥有新的研究方法,才在教育研究领域硕果累累。

5. 机构名称个性化。与20世纪80年代700余家高教研究机构只有一个名称“高教研究所(室)”相比,90年代后,高教研究机构名称正在向着更加个性化、与机构内涵更相符合的方向发展,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的高教研究机构冠名为“教育科学研究院”或“教育学院”;另有24所学校的高教研究机构分别命名为“高等教育研究所”;14所学校称“发展规划处”、“改革与发展研究室”、“发展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2]

6. 机构高层次、专业化。20 世纪 80 年代,高教研究机构专业、专职领导较少,有些学校甚至由退居二线的、或者是学校不好安排的干部担任。90 年代以来,高教研究机构领导大多为专业出身、专职干部,甚至许多学校为使研究与学校工作紧密结合,由校领导直接兼任高教研究机构正职领导,如:北京大学教科院由校党委书记闵维方兼院长;清华大学由校长兼任所长;华中科技大学由学校副书记刘献君兼院长;复旦大学由一位副校长兼任所长;四川大学由学校书记卢铁城兼主任。

7. 教育研究期刊层次提高。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拥有高教研究期刊 500 余家,大多为内部期刊,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在的 300 多家期刊,有 30 多家公开发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等许多期刊已经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 检索源期刊。

二、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设置与发展问题分析

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对高校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减少盲目性,提升办学水平、决策水平及高校自主办学水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发展极不平衡,在许多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步入高层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部分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没有与时俱进,反而走向萎缩。

首先,地区发展不平衡。高教研究机构发展好的高校大多位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4 个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学校均在东部和中部;江苏省高校拥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十几个;而西部的四川省仅四川大学在 2002 年才拥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同为西部,西安地区高校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3 个,成都仅有 1 个。

其次,各高校之间发展不平衡。各高校之间对高教研究机构重视程度、机构发挥作用情况、学位点建设情况、研究水平都存在很大差异。据不完全统计,仅教育部直属高校就有 19 所重点大学没有高教研究机构,还有十几所有高教研究机构的学校没有学位点。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只有 3 所学校的高教研究机构为合署办公型,四川高校的 21 个高教研究机构中却有 10 个为合署办公型。^[3]

再次,机构设置与发展不平衡。前面已经谈到,拥有高教研究机构、建设高水平的高教研究机构已成为各校的共识,高教研究机构的设置呈现了多样化的现状,但从实践来看,不同的设置类型反映了高

校领导对高教研究机构的认识程度,决定了机构的发展前景。前述后 3 种类型的高教研究机构都不利于高教研究的发展,只能使机构陷入“不重视——无作为——更不重视——撤、并、转”的恶性循环。

最后,研究水平、课题层次、研究队伍差别很大。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高教研究机构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基地,许多学校承担了国家、省部级的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丰富,而有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许多学校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梯队,并日益专业化,而有的机构只有三五个人、一间房,没有研究方向。

三、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的发展对策

鉴于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的发展实际,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教研究机构的职能、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决策水平,笔者认为,我国高校高教研究机构应该向着独立建制、直属学校领导,机构规模化,学科化,职能多样化,研究高层次化、特色化,领导专业化、高层次化方向发展。

1. 独立建制、直属学校领导。从实践来看,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现在各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绝大部分为处或学院级机构,直属学校领导。这种机构模式较少受到制约,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和环境,最有利于实现机构的职能。

2. 规模化——机构扩展、队伍专业化。据 1999 年的调查,四川省高校 21 个高教研究机构平均编制只有 3 人,最多 5 人,最少 1 人。^[3]这种队伍现状是不利于发展的。我们知道,规模与发展是成正相关的。高教研究机构要取得很好的发展,必须先从队伍规模建设入手,不断壮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和学历层次,提高研究水平,继而在内部发展成为多个专门研究室,才能使研究深入,机构职能更好地发挥。这一点,已经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高教研究机构的发展所证实。

3. 职能多样化——集研究教学、学科发展、管理、出版为一体。纵观发展状况好的高教研究机构都是集研究、咨询、教学、期刊出版等职能为一体的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由此看来,职能多样化将是高教研究机构发展的方向。当然,各校职能发挥可以有所侧重,不可千人一面。

4. 学科化——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硕士点。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硕士点是一个高教研究机构

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也使高等教育研究深化成为可能。况且高等教育学学科已经成为非师范类院校的学科增长点。为此,有条件的学校或者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学校中的高教研究机构都应该积极努力,争取建立学位点,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工作条件。

5. 特色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特色,机构名称个性化。高教研究机构的百花园应该是姹紫嫣红、异彩纷呈的,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是其生命力所在。正如各个高校都应该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特色一样,高教研究机构也必然应该是各具特色才有利于发展。高教研究机构要致力于形成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以自己的研究风格和特色屹立于全国高教研究机构之林。同时,机构名称应与机构职能、内涵相结合,更加个性化,与内涵相符。

6. 领导高层次、专业化。高教研究机构发展的如何,领导起着关键的作用。鉴于高教研究机构的特殊职能要求,其领导必须是由专职的、热爱高等教育研究的人担任,有条件的高校应尽可能聘用专业人员担任领导职务。笔者认为,最有利于高教研究机构发展的领导模式应该是如北大、清华、复旦、华中科技大学那样,由一位热心高教研究的校领导兼任高教研究机构正职领导,聘任教育学专业出身的常务副职主持日常工作,这样,既可以保证高教研究的专业化、高层次,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又能确保研究与学校教学科研紧密结合,保证研究成果

及时应用到学校发展与改革实践中,更好地发挥高等研究机构的职能。

7. 研究院校化——普通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的职能新定位。院校研究起源于美国,是高等学校的校本研究,目的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学校的实际情况,发现学校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提供决策咨询,以促进学校工作的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单位是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95%以上设在高等学校中。促进所属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当今高校规模扩大,任务繁多,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日益复杂,要求改经验管理为科学管理;高等教育科学和管理科学发展很快,为高教研究提供了科学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我国高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原则正在逐步实施中,面向市场要研究办学的效率与效益;自主办学必须自主决策,自主决策要有科学依据;高等学校面向产业化、大众化、国际化等大趋势,仅凭经验办学不能解决诸多新问题。为此,普通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的职能应当定位于院校研究。

参考文献:

- [1]周远清.重视与加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2,(3):3-4.
- [2]教育部直属高校[EB/OL].www.edu.cn,2004-03-01.
- [3]赵锦莱,李勇等.四川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状况的调查分析[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科版),2000,(1):60-61.